

度門港口紀事



厦门港口纪事

主编: 邓孙禄
副主编: 陈国清

编写人员
陈国清 郭加慈
叶志愿 黄国栋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1992年6月

(辽)新登字 11 号

内容提要

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主要对外贸易港之一,又是我国实行某些自由港政策的特区港口,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历来为世人所瞩目。本纪事上起远古时期,下迄 1990 年。对明清时期厦门港的兴起,鸦片战争后沦为“五口通商”口岸和本世纪八十年代的迅速发展都进行了系统的记述。同时,对厦门口岸各管理机构、对外贸易、交通和建设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情也进行了记述。本书对研究厦门港的历史,重新认识厦门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和厦门及闽南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可供水运、交通、口岸、外贸、历史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厦门港口纪事

主编: 邓孙禄 副主编: 陈国清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责任编辑: 孙光圻 封面设计: 王 艳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8.5 千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5.50 元
ISBN 7-5632-0379-6/K·11

任编辑：孙光圻
面题字：黄和荣





ISBN7-5632-0379-6/K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wanfangdata.com.cn

定价: 5.50 元

序

《厦门港口纪事》即将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主要对外贸易港之一，历来是军事要津、对台航运的专门口岸、华侨出入的门户和对外开放的港口，又是反抗侵略与维护和平的前哨阵地。整理、编纂和研究厦门港1200多年的历史，对进一步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厦门港根据中央交通部、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和福建省交通厅的统一部署，于1981年8月组建了港史编写组。之后又充实和加强编写力量，正式成立了厦门港史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抓紧了编写步伐，加快了工作进程，为快出书、出好书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现在，《厦门港口纪事》终于脱稿，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紧接着还将陆续出版《厦门港史》、《厦门港志》等书籍。

编纂出版厦门港史志等书籍，是编纂《中国水运史丛书》和《福建地方交通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件极为重要而有意义的事。因此，厦门港的编史修志工作应该再接再厉，为填补厦门港史书的空白，为我国史志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作出更大的贡献。

黄和荣

1991年12月

编 写 说 明

一、在厦门港 1200 多年的历史沿革中，其各个时期的盛衰与厦门地区的发展有着互为依存的密切关系。厦门港的发展历史是厦门市的缩影。港口作为城市的一个纽带和窗口，同其他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厦门港口纪事》(以下简称本纪事)以记述厦门港口的事件为主，但又不局限于港口本身，其内容还包括政府的有关施政方针、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与本口岸各单位和交通运输各单位的大事等。

二、本纪事所记时间，凡信而有征者，尽量写明年、月、日；无法考证或属某年、某月内完成者，则列在其相应的年、月条目之后。

三、本纪事的古代与近代(民国以前)的年份，以夏历用汉字表示，民国以后的年份和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四、本纪事基本上按编年体排列，但对某些重要或专项事件，为说明其始末，则不受年代所限，而汇列于同一条目之后。

五、本纪事虽五易其稿，并经本编委会和部分专家、学者考证评审，但由于受编者水平限制，错漏仍属难免，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邓孙禄

1991 年 12 月

厦门港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和荣

副主任委员:杨锦来 刘明富 邓孙禄 陈小旋
委 员:曾英国 张 豪 庄怀安 林杰生 许碧梧
陈明华 白剑扬 林仲琪 陈 梁 余明端
曾志琼 邱明龙 陈国清

顾问:庄为玑 朱万晶 邢 寿 茅伯科

主编:邓孙禄

副主编:陈国清

编写人员:陈国清 郭加慈 叶志愿 黄国栋 邱明龙
王伟伟 李向宏

目 录

序

编写说明

第一章 古代部分	(1)
唐代(618~907).....	(1)
宋代(960~1278)	(2)
元代(1279~1367).....	(3)
明代(1368~1644).....	(3)
郑成功辖治时期(1645~1683).....	(9)
清代前中期(1684~1839)	(15)
第二章 近代部分	(37)
清代后期(1840~1911)	(37)
民国前中期(1912~1937)	(76)
抗日战争时期(1938~1945)	(99)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109)
第三章 现代部分	(115)
建国后恢复时期(1949~1952).....	(115)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	(129)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	(134)
调整时期(1963~1965).....	(140)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	(142)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	(144)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	(151)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	(162)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1990).....	(186)

编后记

第一章 古代部分

(远古～1839 年)

大约距今三千多年前

鹭岛(厦门岛)上就有古越族人居住生活，他们利用自然港湾，从事渔猎活动。

唐代(618～907 年)

唐神龙年间(706 年左右)

长溪进士薛令之举家迁居鹭岛，家居洪济山之北。

汉衣冠士族陆续迁居岛上，中原文化传播到这个海中小岛。

唐开元二十年(732 年)

鹭岛开始称“新城”，属江南东道泉州南安县管辖。

唐天宝十五年(755 年)

颖川人仕陈禧，为逃避安史之乱，带领其家族 300 余口连夜由福清乘船迁居新城。家住洪济山之南，故古代厦门有“南陈北薛”之

说。此时海上交通已很便捷。

唐大中元年(847年)

新城成立行政机构“嘉禾里”，隶属清源郡南安县。陈禧的曾孙陈黯与江苏、湖南、湖北、陕西以及阿拉伯、朝鲜人都有交通往来。

宋代(960~1278年)

宋嘉祐三年(1058年)

嘉禾屿已成为泉州、漳州港与广州港之间来往船舶的中途寄泊、加水的停留港。五通、牛家村、码头社、土地公祖(今开元路)已有原始渡口。

宋元祐二年(1087年)

泉州港设立市舶司。嘉禾屿作为泉州大港的外围辅助港，输出青瓷等货物。这个时期岛上设了五通、东渡两处官渡。即五通与同安刘五店对渡；东渡与嵩屿对渡。筼筜港边的码头社(美仁社)成为商船渔船集泊、避风的港口。

宋绍兴元年间(1131年)

有小股海盗侵犯嘉禾屿外港的青屿岛。此后，嘉禾屿就开始设防驻兵。至南宋开禧、嘉定、绍定年间，也有海寇侵犯泉漳沿海，使嘉禾屿的军事防务不断加强。

宋景炎元年(1276年)

五月 南宋将领张世杰、陆秀夫拥益王赵是即位于福州，元兵逼，张等用船护送帝及卫王入泉州港，泉州港招抚使蒲寿庚叛降，闭城不纳，宋帝遂至嘉禾屿，登五通，出大担赴潮州。在嘉禾屿和鼓浪屿留下许多“圣迹”。

是年冬 张世杰驻师嘉禾屿。

元代(1279~1367年)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

元世祖忽必烈在嘉禾屿设立“嘉禾千户所”。该军政机构拥有战舰，嘉禾屿的军港地位初步建立。

元代，福建中南部沿海地区烧制的仿龙泉青瓷大量销往国外，其中就有同安汀溪窑、靠近嘉禾屿的后溪窑、东孚东窑等三处生产的瓷器。这些瓷器是通过刘五店港和嘉禾屿港运往泉州港转口外销，或是直接运往国外的。

明代(1368~1644年)

明洪武元年(1368年)

元末明初，嘉禾里及附近居民，就开始从嘉禾屿港口出洋谋

生。据载,约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厦门人李君常由厦门往马六甲,杏林新垵邱毛德等也自厦门出洋谋生。

明成化元年(1465年),同安汀溪黄氏族祖自厦门出洋谋生。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同安船主高贤、李章的商船运载80人自厦门到朝鲜。

明洪武七年(1374年)

明政府惟恐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取贿,罢泉州市舶司。明永乐元年(1403年),为增加财政收入又予恢复。但仅允许同琉球“朝贡”贸易。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市舶司移驻福州,也只准与日本“朝贡”贸易。这对福州港和泉州港的发展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远离封建统治中心的漳州月港和厦门港,就成了海上走私贸易的主要口岸。此时的厦门港,海上交通初具规模,已有通洋航线10条。分别交通吕宋、交趾、柬埔寨、暹罗、咬留吧、长崎、咬大泥、麻六甲、彭亨、琉球等。明永乐、宣德间(1405~1433年),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上,就有郑和船队经过嘉禾千户所的明确记载。成书于明中叶的《西洋朝贡典录》一书,也记载了由厦门出口往暹罗等国的针路。明代出版的《顺风相送》,也详细记载了厦门港通往马来西亚、泰国、马来亚、爪哇、印尼、菲律宾、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港口的航线、针路、更次等。清代问世,并经今人考释的《古航海图考释》,其中的原图53、54、55,也标出了厦门港口及港外大担、二担、青屿、浯屿等重要岛屿及位置,还标出了岛上最高处云顶岩和厦门港南面太武山上作为航标的延寿塔。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

江夏侯周德兴受帝之命,来闽筑城防倭。他在嘉禾屿设“中左

守御千户所”。从此，嘉禾里称“中左所”。同年，周德兴营造厦门城（现工人文化宫一带），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成。城周围425丈，墙高1.9丈，设东、西、南、北四门。由永宁卫中左千户所官军守御，辖东澳、五通两寨，隶属福建都指挥史司。

明洪武年间，厦门设置浯屿水寨。浯屿水寨开始设在浯屿岛，控制厦门外港海域，调拨永宁福泉州所兵员2242人，连同漳州卫兵共2898人。

明景泰三年（1452年），巡抚焦宏认为浯屿孤悬海中，交通指挥不便，便将水寨移到了厦门，仍称浯屿寨。浯屿水寨共有兵船32艘，驾驶兵船的军士580名。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福建南路参将移驻厦门。南路参将初设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辖区南起诏安至广东界，北至晋江祥芝，驻镇漳州而控制整个闽南地区。后移至铜山，因铜山地方偏僻，复移驻厦门，以便居中调度闽南兵力，管辖铜山、浯屿二寨和浯铜、澎湖二处游兵等。领兵3000名。浯屿游兵设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驻扎中左所，有兵将536名，哨船20艘，驾船军士300名。

为了防御外来的侵犯，在明天启初年（1621年），明政府在厦门设泉州游击一员，统辖浯屿寨军和浯铜游兵，这和现存于鸿山寺后石刻相符。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二十六日，钦差镇守福建地方处都督徐一鸣、督游击将军赵颇、坐营陈天策，率三营浙兵、把总朱梁、王宗兆、李知钢等到此抵御“红夷”（荷兰殖民者），兵船已由初建时的32艘，增至福、哨、冬、鸟等各类兵船48艘。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

葡萄牙商船首次到厦门港贸易，泊浯屿，并在厦门设立公行。厦门与葡萄牙的贸易，大约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明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西班牙商船又来厦门。在1571~1580年的10年间,由厦门港和月港开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每年有30~40艘。出口商品有日用品、瓷器、铁、铜、丝绸、陶器、农副产品、中药材、水果、糖、火药、水银等,每年进出口价值150万金元左右。

到明代中后期,尽管明朝廷特别强调严禁与日通商,但福建商民“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厦门港与日本的货运航线不断发展。在16世纪前,闽人赴日多数取道朝鲜,或经宁波港东渡。到了16世纪,逐渐开辟了台湾海峡和琉球群岛往日本的航线,此后又发展为厦门~长崎的直达航线。即由厦门港“大担放洋,先至乌丘祭献妈祖,后横渡台湾海峡,经鸡笼(基隆)头直取长崎港南的天堂(天草)而入长崎港。这条新航线的开辟,是明代福建对日交通的一个历史性成果。它促进了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我国众多的商品,随海船输入日本的就有纱、罗、绢、布、白糖、瓷器、果品、香料、扇、梳、栉蓖、毡毯、袜、针、纸、杉木等20多种。日本的一些名产如倭刀、倭戒指、金耳环也为厦门商船带回。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日本天鹅绒制作技术的传入与中国先进造船技术的输出。

明嘉靖九年(1530年)

巡抚胡琏议移巡海道镇漳州,设安边馆于海沧,岁委通判一员驻守,一岁两易,专门盘查来往船舶。嘉靖三十年(1551年),设靖海馆于厦门南路参将的戍防汛地,以海沧的安边馆为其附属机构。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改靖海馆为海防馆,增设海防同知一员镇守。

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漳州月港定为对外通商港口,开设“洋市”,设在厦门的海防馆便被改为督饷馆,管理商船出海,发给船引,负责盘验船舶,征收税饷。这是厦门港最早的港口管理机构。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督饷馆移驻漳属圭屿。

明崇祯六年(1633年),漳州月港洋市关闭。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四月 屯集浙江双屿港的倭寇被明官军攻破,所余残寇南逃到厦门外港浯屿岛,被都指挥卢镗率兵击败,逃窜离去。同年六月,倭寇又侵袭厦门港外港的大担等岛屿,由于官军严加防范,寇又逃离。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再次屯泊浯屿岛,抢掠同安,突至月港,掳杀千余家,频繁往来漳州与潮州之间。从此之后,闽南一带连年倭患,“村无完舍,民无定居”,厦门外港的浯屿岛,遂成为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的基地。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以后三年间,倭寇屡剿屡犯,厦门港深受其害。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佛郎机”(葡萄牙)殖民者侵犯漳州月港和厦门浯屿岛,大肆在福建沿海进行走私贸易活动,抢掠财货,企图寻找新的殖民地。闽南商人常与佛郎机海盗商人贸易,官军禁而不止,“巡海道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都御史朱纨抓获通贩者九十余人斩之”,夷商走私船才怏然离去。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二十六日,朱纨率领官军,驱逐“旧浯屿夹板尖艚叭喇唬等项贼船,同佛郎机国夷王船,陆续追击出境”。葡人在浯屿、月港被逐后,仍活动于福建南部沿海的诏安一带,最后窜犯广东,占据澳门。

明隆庆五年(1571年)

从厦门港出国旅居马尼拉的华侨有150多人。至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尽管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大肆屠杀华侨,但仍

发展到 30 000 余人。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仅从厦门开往马尼拉的厦门商船,就有三、四十艘,且均满载搭客。

明万历三年(1575 年)

七月五日 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总督,派提达和马丁等出使中国,所乘专船由博利玻璃港抵达厦门,经同安赴泉州北上。

明天启三年(1623 年),荷兰国贡使彼得范和伦爵士经厦门取道福州晋京。

明崇祯四年(1631 年),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传教士、意大利人高支和西班牙人郭琦、施自安等 11 人,自马尼拉抵达厦门。

明天启二年(1622 年)

有厦门商船 3 艘,由厦门港开往爪哇、巴达维亚(巴城,今雅加达)贸易。天启六年(1626 年),有厦门商船 4 艘,分别运载 500 人和 450 人往巴城。七年(1627 年)又有厦门商船 5 艘,分别运载 400 人、350 人和 500 人往巴城。

七月一日 荷兰殖民者(“红夷”)派船侵占我国领土澎湖列岛,并把它作为海军基地,继而,又向福建当局提出了与厦门港通商的要求。在所索不允的情况下,派战船 5 艘侵犯六敖,被副总兵张嘉策、把总刘英击退。后放洋抛泊浯屿岛,犯中左(厦门),盘踞内港,连战数日,夷又登岸攻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遂入泊圭屿,直窥海澄。经明军内外夹攻,入侵者才惊逃厦门,入曾厝垵,后被官兵杀伤。今虎溪岩、鸿山寺等处尚留存着明代官军剿灭“红夷”的石刻。